

文章编号:1000-0550(2024)00-0000-00

DOI:10.14027/j.issn.1000-0550.2024.125

汞示踪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火山沉积记录研究进展

杨晨¹, 林雯洁¹, 金思敏², 李明松³, 沈俊¹

1.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 武汉 430074

2.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环境学院, 武汉 430074

3.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造山带与地壳演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871

摘要 【意义】自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在使用化石燃料的过程中不断向大气排放 CO₂等温室气体, 引起了剧烈的气候环境扰动和严重的生物危机。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PETM, ~56 Ma) 转折期发生了巨量的碳排放事件, 碳排放速率与当前的排放进程最为接近, 探索 PETM 时期的碳排放对地球宜居性影响的过程和机制, 可以为预估地球未来气候变化趋势提供地质案例, 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进展】近年来, 对于 PETM 碳排放的触发机制问题仍存在争议, 已有研究证实北大西洋火成岩省 (North Atlantic Large Igneous Province, NAIP) 的岩浆活动与 PETM 之间存在时间耦合性, 表明 NAIP 可能触发了这一地球宜居性扰动事件, 但是目前该转折期火山活动和气候环境波动的因果关系还不明晰, 其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在沉积岩中示踪火山活动记录。【结论与展望】近年来, 沉积物中的汞元素浓度及其同位素已被广泛用于示踪地质历史时期的火山活动。但是, 目前对 PETM 事件的汞记录研究主要集中在靠近 NAIP 喷发区域的近岸地区, 而缺乏对远离喷发中心的开阔海地区的研究, 制约了对 NAIP 活动影响范围和环境效应的认知。本文针对 PETM 事件汞沉积示踪古火山活动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的回顾, 阐述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梳理了 NAIP 与 PETM 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 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 北大西洋火成岩省; 汞浓度及同位素; 海洋缺氧

第一作者 杨晨, 女, 2001 年生, 硕士研究生, 沉积学, E-mail: yangchen77@cug.edu.cn

通信作者 沈俊, 男, 研究员, E-mail: shenjun@cug.edu.cn

中图分类号 P534.612 **文献标志码** A

0 引言

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燃烧化石燃料, 释放了大量的 CO₂等温室气体到大气中, 导致地球的平均气温相比工业革命之前显著升高^[1-2]。其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气候系统巨变, 包括海平面的显著上升、极端天气事件(如极端热事件、干旱、强降水等)的频繁发生、海冰的快速消融以及生物物种的快速消亡等^[1], 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地质历史时期发生了多次由大气中 CO₂浓度升高所导致的气候变化事件, 例如二叠纪—三叠纪灭绝事件^[3]、早侏罗世 Toarcian 早期大洋缺氧事件^[4]、白垩纪 Aptian 早期大洋缺氧事件^[5]、白垩纪 Cenomanian 末期大洋缺氧事件^[6]、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等^[7-8](图 1)。然而, 由于海陆分布格局、生物面貌和气候变化速率与当今存在巨大差异, 只有少数地质事件能够为现今

收稿日期: 2024-08-01; 收修改稿日期: 2024-11-19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22YFF080290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405053) [Foundation: National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 No. 2022YFF0802900;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42405053]

的全球变化进程提供有益的参考。其中,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PETM, ~56 Ma)被认为是由巨量轻碳(富¹²C碳)注入大气系统所引发的快速升温事件^[9-11],这一过程释放的CO₂总量和速率与工业革命以来人为排放最为接近^[12](图1)。因此,对PETM事件的碳排放触发机制进行深入探索,对于人类预估地球气候未来变化趋势、了解宜居地球的演化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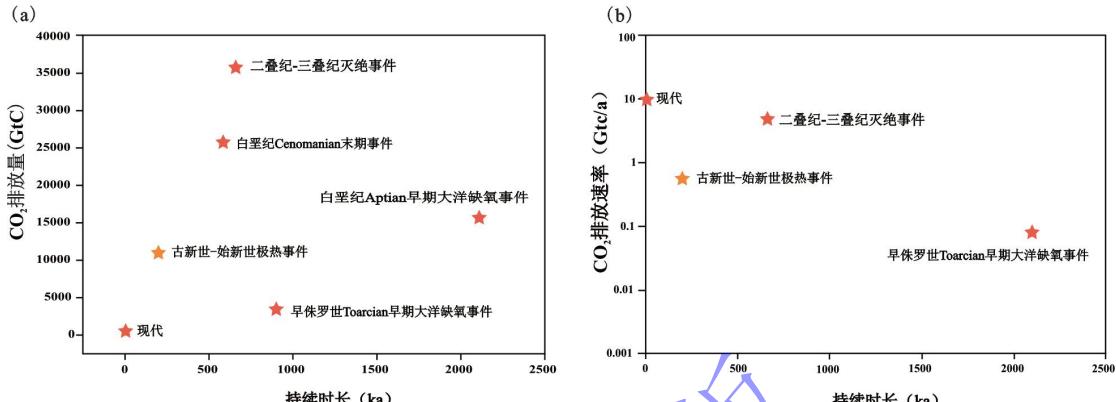


图1 现今和极热事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及其速率对比图(数据来自文献^[2-6,8])

Fig.1 Comparison of carbon emissions from hyperthermal events and their rates (data from references ^[2-6,8])

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13-14]是新生代中引人注目的一次极端地球宜居性扰动事件,主要以碳同位负偏约3‰~4‰为特征^[9-11],持续时间在150~200 ka^[15-16]。在该时期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升高了4 °C~6 °C^[17],这对地球的生态、气候和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24](图2)。在生态系统方面:部分底栖有孔虫灭绝^[25];浮游有孔虫多样性普遍增加^[26];出现偶蹄目、奇蹄目、灵长目等动物^[24],哺乳动物在此期间快速演化^[9]。在气候环境方面:海平面发生变化^[27];极端降水事件频繁,气候的季节性加强^[28-29];大洋酸化^[30];海洋脱氧、部分海洋水体达到缺氧程度^[31]等。该转折期内气候、环境和生物演变剧烈扰动,被认为是大量轻碳(富含¹²C)输入到地表所致。所以,该事件是探究深时碳循环扰动对地球宜居性演变影响的典型案例。

目前对于该转折期轻碳的来源仍存在争议。首先,有部分研究认为海底天然气水合物的热分解是巨量轻碳的来源,海底天然气水合物广泛分布于陆源外围的深海沉积物中,海洋环流的变化可能导致海底温度的升高,进而引发天然气水合物的分解和释放,导致碳同位素的负偏^[12,32-33];其次,有些学者认为高纬地区冻土层融化,使得有机质分解,分解的有机物质也会以二氧化碳和甲烷的形式释放巨量的轻碳^[34]。有研究认为天文轨道控制的气候变化可能触发了这一碳排放进程^[13,35-37]。第三,有学者提出了地外成因说。例如,Kent *et al.*^[38]通过分析大西洋滨海平原的钻孔样本,发现在PETM过渡期高岭土等黏土矿物富集的大陆架沉积物中存在异常富集的磁性纳米颗粒,认为富¹²C的彗星撞击地球是这一时期巨量碳的来源。

[38-39]; 有研究发现在大西洋边缘的三个海相古新世—始新世界线剖面地层中存在硅酸盐玻璃微珠, 也被认为是外星撞击地球的地质证据^[40]。第四, 大量研究证明北大西洋火成岩省(North Atlantic Large Igneous Province, NAIP) 的岩浆活动^[8,41-44]或热液喷口复合体与有机质围岩的接触热变质作用^[45-46]可能是 PETM 时期巨量碳的来源。然而, 目前火山活动对该时期气候环境变化的因果关系还不明确, 其主要的瓶颈在于环境和生物信息保存丰富的沉积岩中缺乏火山活动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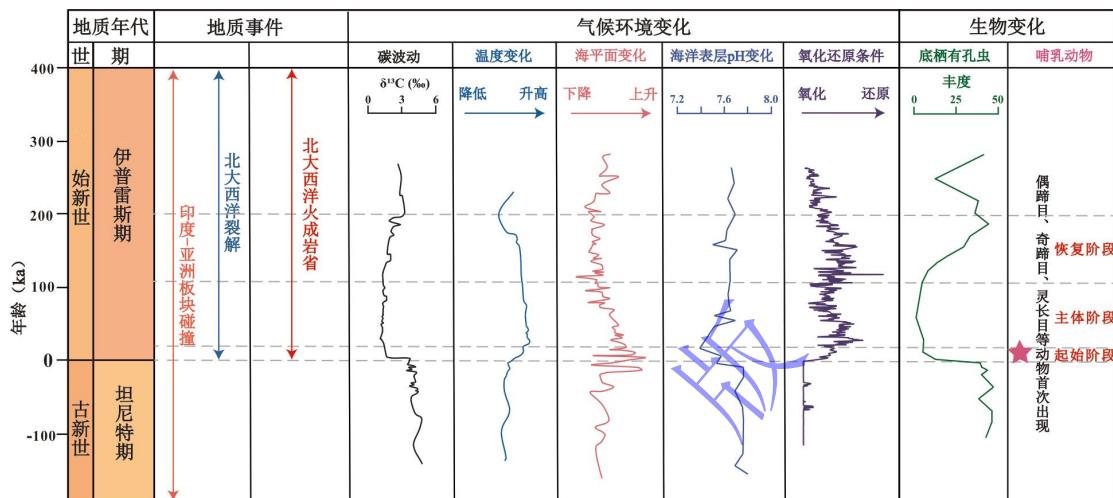


图2 PETM 时期对应地质事件^[19]及全岩碳同位素^[20]、温度^[22]、海平面^[18]、海洋表层 pH^[8]、氧化还原条件^[21]、生物^[23-24]变化

Fig.2 Geological events^[19] and changes in bulk carbon isotope^[20], temperature^[22], sea-level^[18], ocean surface pH^[8], redox condition^[21] and biology^[23-24] during the PETM interval

沉积物中火山活动可以利用特殊元素及其同位素指标进行识别, 如 Hg、 $\Delta^{199}\text{Hg}$ 、 $^{187}\text{Os}/^{188}\text{Os}$ 与 $\Delta^{33}\text{S}$ 等。在示踪海底火山活动时, Os(锇)同位素可以作为一项重要的指标^[47]。沉积物中 Os 同位素向非放射性 Os 的转变可能是由于火山活动或陨石撞击产生的非放射性 Os 的输入增加引起的。然而, 仅凭 Os 同位素的数据, 不能完全排除陨石撞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48], 并且其不能示踪不同圈层(如陆地系统)和大范围(如全球范围)的火山活动记录。此外, 硫(S)同位素常被用于区分平流层和对流层的火山喷发^[49], 然而, 现有的 $\Delta^{33}\text{S}$ 指标与火山灰层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完全吻合^[50], 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评估。

近来研究表明, 沉积物中汞元素含量及其同位素比值可以有效示踪古火山活动^[51-52], 因此被广泛用于对包括 PETM 事件在内的多次环境扰动事件研究之中^[44,52-54]。对于 PETM 事件, 研究人员发现汞含量的分布具有空间不均一性, 即距离 NAIP 越近, 沉积物中的汞含量越高; 相反, 距离 NAIP 越远, 汞的浓度则相对较低^[44,55-56]。此外, Jin *et al.*^[44]依据 PETM 时期 $\Delta^{199}\text{Hg}$ 的变化验证了 NAIP 火山活动与 PETM 存在因果关系。目前对于 PETM 时期火山沉积汞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Hg 元素含量异常的研究, 关于 Hg 的标准化研究等还存在一些

问题,且缺少不同沉积环境剖面的汞同位素研究。因此,本文对 PETM 事件火山沉积汞的研究现状进行阐述,并对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前景进行了评述。

1 北大西洋火成岩省(NAIP)火山活动

在地质历史时期中,大规模的火山活动往往与较大的环境气候扰动事件有关^[57]。在晚古新世,发生了大规模火山喷发——北大西洋火成岩省^[58]。20世纪90年代,Eldholm *et al.*^[59]提出了PETM期间的气候变化与NAIP之间存在联系,随后研究人员开始深入研究火山去气对气候演变的影响,并探索这些因素是否可能触发PETM。大量地质年代学证据表明,NAIP与PETM事件在时间上有着密切联系^[43,60-61]。在东格陵兰岛地区沉积的年龄介于56.0~55.5 Ma、厚度5 000~6 000 m的溢流玄武岩可为此提供证据支撑^[42-43,62]。在PETM事件开始及之前北欧地区沉积的多层火山灰也可为NAIP的剧烈活动提供直接证据^[55,63]。此外,基于反射地震剖面及相关钻孔资料,研究人员提出,由于大量地幔来源的熔融物质上涌并侵入北大西洋底部富含有机质的沉积层,导致有机质受热迅速分解并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CO_2 、 CH_4),最终导致了PETM事件的发生^[41,64-65]。除了上述研究外,前人基于Os同位素的研究认为,部分地区 $^{187}\text{Os}/^{188}\text{Os}$ 比率的变化是由北大西洋火成岩省喷发出的大量玄武岩经过风化作用后向环境中输入非放射性Os元素所引起的^[66-68],这也为北大西洋火成岩省与PETM事件的联系提供了支撑证据。

1.1 北大西洋火成岩省岩浆活动

北大西洋火成岩省的熔岩面积为 $1.3 \times 10^6 \text{ km}^2$,岩浆体积约为 $5 \times 10^6 \sim 10 \times 10^6 \text{ km}^3$,主要由拉斑质玄武岩组成^[43,58]。其岩浆活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发生约在62~58 Ma,这阶段被认为与地幔柱柱头热点初始到达有关;第二阶段发生在57~53 Ma,其中56~55 Ma岩浆活动较为活跃,这一阶段与PETM事件在时间上存在耦合^[60]。北大西洋火成岩省的剧烈活动主要以火山去气的方式向大气中注入大量 CO_2 ,从而使得碳循环系统扰动。基于硼、碳同位素数据和地球系统模型的反演模拟,Gutjahr *et al.*^[8]提出PETM碳同位素和海水pH的协同变化需要至少10 000 Gt(十亿吨)碳(C)注入海—气系统才能实现。另一项估算研究认为,玄武质岩浆中 CO_2 含量约在0.2~0.6 wt.%^[69-70],假设岩浆 CO_2 含量为0.5 wt.%和岩浆脱气效力约为 3.5 Mt C km^{-3} ^[71](百万吨碳/立方千米),则NAIP火山去气过程可能可以将21 000~35 000 Gt碳注入海气系统之中^[46],满足上述反演模拟的碳排放需求量。这些研究表明,北大西洋火成岩省的喷发和火山去气可能会形成巨量的碳源。

1.2 接触热变质作用

除了上述火山喷出作用向大气释放大量 CO₂之外, 富有机质沉积地层的接触热变质作用也可提供巨量的碳源^[41,45]。岩浆侵入至富含有机质沉积地层, 加热产生的温室气体的快速释放可以触发 PETM 的发生^[41]。有研究发现, 位于挪威海的 Vøring 和 Møre 盆地存在数以千计的热液喷口^[45], Svensen *et al.*^[64]对 Vøring 盆地的侵入体进行锆石 U-Pb 定年分析, 结果显示岩浆侵入 Vøring 盆地的时间为 55.6±0.3 Ma 和 56.3±0.4 Ma, 这与 PETM 发生时间相吻合。据估计, 挪威大陆边缘的热液喷口会释放 225~2 250 Gt 碳^[41], 而 NAIP 岩浆侵入区域内的有机质地层发生接触热变质作用可能释放约 13 000 Gt 碳^[46]。如果许多侵入体—火山通道同时喷发, 能够具有在短时间内 (<100 ka) 释放巨量碳的潜力^[68]。这也为富有机质沉积地层的接触热变质作用触发 PETM 事件的发生提供证据。此外, 热液喷口复合体会多次喷发^[72], 因此, 挥发物质会随着多次喷发被释放到外界环境中^[73]。

2 汞指示古火山活动

2.1 汞循环

汞, 俗称水银, 为常温常压条件下唯一呈液态的金属^[74], 在常温常压下会蒸发, 主要以气态形式存在于大气之中。汞在大气环境中主要有三种存在方式: (1) 气态单质汞 (Hg⁰); (2) 气态氧化汞 (Hg²⁺) ; (3) 颗粒汞 (Hg_p)^[74]。在地质历史时期, 火山活动和海底热液排放被认为是海洋—大气系统中天然汞的主要来源^[75-78], 此外, 森林野火和陆地风化作用增强也可以使得陆地系统中的汞释放到大气之中。火山释放的汞大多以气态单质汞 (Hg⁰) 的形式存在, 并在短时间内 (0.5~2 年) 通过大气循环运输到全球范围^[74,79]。Hg⁰ 通过光化学反应经臭氧、卤素或羟基自由基氧化为活性 Hg²⁺, 随后经过干湿沉降于大陆和海洋环境中, 汞在海洋中停留时间较短 (几百年), 容易被捕获至海洋沉积物中^[80-81]。也有部分 Hg⁰ 转化为 Hg_p, Hg_p 通在大气中停留时间很短(天至周尺度), 通过干湿沉降被移出大气系统^[76,78]。

在陆地环境中, 汞的主要来源为大气, Hg⁰ 被植物叶片吸收或被赋存于土壤有机质之中^[82], 随后被氧化, 赋存于有机质或黏土等成分之中^[83], 通过河流径流携带至湖泊、海洋之中^[84]。在水生环境中, 汞以 Hg⁰_{aq}、Hg²⁺_{aq}、甲基汞 (MeHg) 、二甲基汞 (DMHg) 以及颗粒汞 (Hg_p) 和胶体汞的形式存在^[76,85], 海洋表面的汞交换较为快速并延长了大气中汞的停留时间, 沉积到海洋中的 Hg²⁺ 经过一些生物或光化学作用可以被还原为 Hg⁰ 吸附在颗粒上或直接形成甲基汞 (MeHg) , 最终这些 MeHg 会转化为有机汞复合物 (Hg-OM) , 被固存在海洋沉积物中, 完成汞的循环^[86-90] (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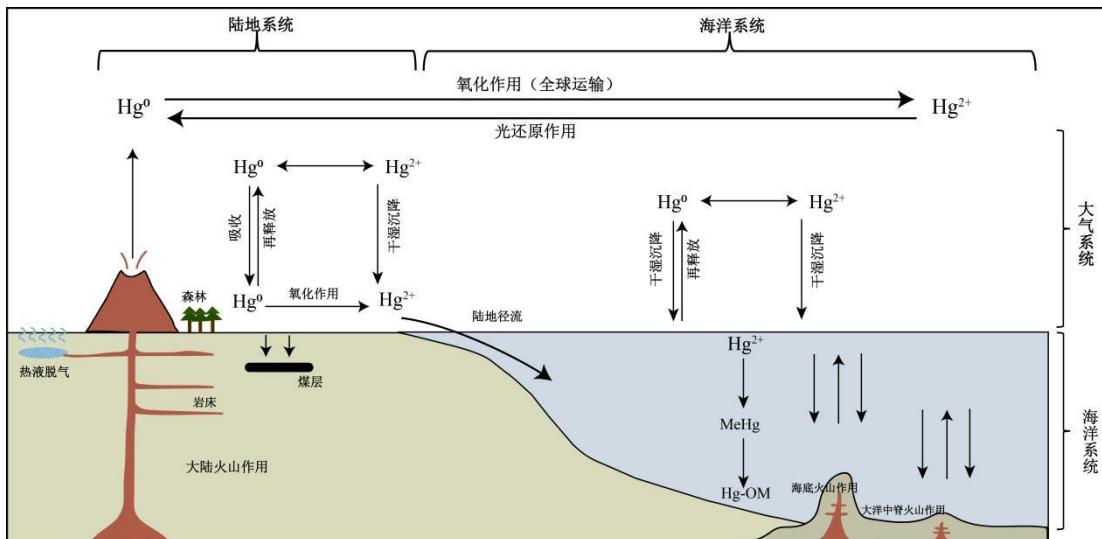


图 3 自然界中汞循环简图 (据文献[88-90]修改)

Fig.3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natural mercury cycle (modeled from references [88-90])

2.2 汞同位素

在自然界中，汞有 7 种稳定同位素，其自然丰度分别为： $^{196}\text{Hg}=0.16\%$ ， $^{198}\text{Hg}=10.04\%$ ， $^{199}\text{Hg}=16.94\%$ ， $^{200}\text{Hg}=23.14\%$ ， $^{201}\text{Hg}=13.17\%$ ， $^{202}\text{Hg}=29.73\%$ ， $^{204}\text{Hg}=6.82\%$ ^[91]。汞在循环过程中会产生独特的同位素分馏，主要方式为：质量分馏 (mass dependent fractionation，简称 MDF，常用 $\delta^{202}\text{Hg}$ 表示) 和非质量分馏 (mass independent fractionation，简称 MIF，常用 $\Delta^{199}\text{Hg}$ 表示)。汞同位素的质量分馏可以发生在各种物理 (如蒸发)、化学 (如化学还原) 和生物过程中，而其非质量同位素，特别是奇数非质量分馏同位素 (如 $\Delta^{199}\text{Hg}$) 主要在光化学还原作用下发生明显分馏，其他地表的生物化学过程则对其分馏影响不大^[92]。因此，汞同位素的非质量分馏可以很好地示踪地质历史时期汞的来源。汞的同位素组成常用 δ 值表示，具体公式^[92]如下所示：

$$\delta^{\text{XXXHg}} (\%) = [(\text{XXXHg}/198\text{Hg})_{\text{样品}} / (\text{XXXHg}/198\text{Hg})_{\text{标准}} - 1] \times 1000 \quad (1)$$

式中：XXX 为汞同位素的质量数 (199、200、201、202 和 204)。

汞同位素的 MIF 值用 $\Delta^{\text{XXXHg}} (\%)$ 表示，为实测的 δ^{XXXHg} 值与以 $\delta^{202}\text{Hg}$ 为参考值所得的理论值的差值^[92]：

$$\Delta^{\text{XXXHg}} = \delta^{\text{XXXHg}} - \beta \times \delta^{202}\text{Hg} \quad (2)$$

式中：XXX 为汞同位素的质量数 (199、200、201 和 204)， β 描述质量相关分馏的参数，其具体值为：0.252 0、0.502 4、0.752 0、1.493 0^[92]。

对大气不同形态汞的同位素分析表明，气态单质汞 (Hg^0) 具有偏负的 $\Delta^{199}\text{Hg}$ 值，气态氧化汞 (Hg^{2+}) 具有偏正的 $\Delta^{199}\text{Hg}$ 值^[93]。现代火山直接排放的 $\Delta^{199}\text{Hg}$ 值接近于 0‰^[94]。在地质历史时期，Hg 通过火山和热液活动从地球的深层储层释放到大气中，此来源的 Hg 不发

生非质量分馏, $\Delta^{199}\text{Hg}$ 值接近零^[82]。在陆地体系中, 植被或土壤中汞主要以大气 Hg^0 为主, 这使得陆相沉积物所记录的 $\Delta^{199}\text{Hg}$ 值主要以负值为主^[92]。因此, 在浅海近岸环境中, 陆地径流所输入的汞元素会使得沉积物中记录的 $\Delta^{199}\text{Hg}$ 为负值^[95]。此外, 火山输入的 Hg 在长距离运输时会被氧化为 Hg^{2+} , 通过干湿沉降至环境之中, 在远洋环境或深海环境中, 沉积物中以 Hg^{2+} 为主, 因此, $\Delta^{199}\text{Hg}$ 的记录趋于正值^[92]。

3 PETM 事件的火山沉积汞记录研究现状

迄今为止, 已在全球分布的 19 个 PETM 剖面或钻孔中有汞浓度的报道^[44,55-56,68,96-99] (图 4), 上述剖面或钻孔的信息和数据^[100-108]如表 1 所示。大部分研究点位在 PETM 界线附近地层中有汞异常值的出现, 这支持北大西洋火成岩省的火山活动为 PETM 事件的触发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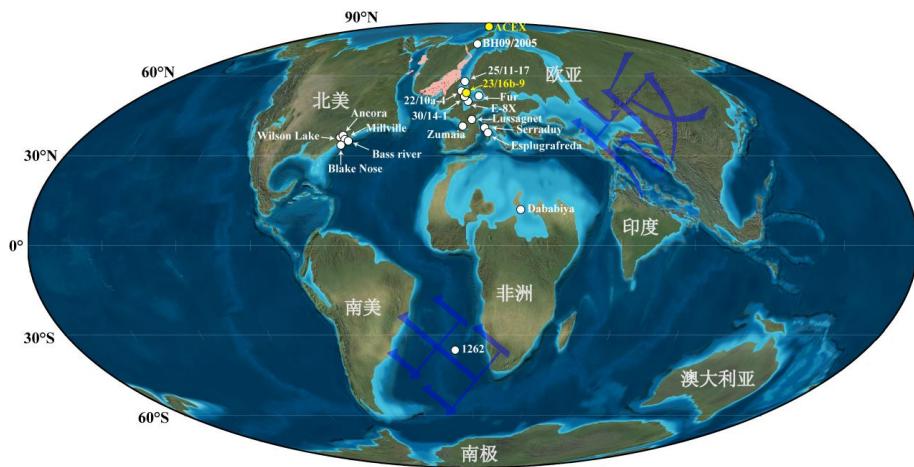


图 4 PETM 转折期北大西洋火成岩省及研究地区分布

古地理图改编用自 Ron Blakey©2016 Colorado Plateau Geosystems Inc. 网址: <https://deep timemaps.com/> (白色圆圈表示汞含量研究点位, 黄色圆圈表示汞同位素研究点位)

Fig.4 Regional map of the location of the North Atlantic Igneous Province (NAIP) and study area at 56 Ma
Geo-map adapted from Ron Blakey© 2016 Colorado Plateau Geosystems Inc. <https://deep timemaps.com/> (white circles = sites with Hg and associated data; yellow circles = Hg isotopes and associated data)

表 1 PETM 汞研究地区信息表

Table 1 PETM Hg records

研究点位	位置	经纬度	古环境及古水深	氧化还原状态	氧化还原变化发生时间
25/11-17 ^[55]	北海盆地	59°3'27" N, 2°29'7" E	深海盆地	/	/
22/10a-4 ^[56]	北海盆地	57°44'8.47" N, 1°50'26.59" E	深海盆地	/	/
23/16b-9 ^[44]	北海盆地	57°26'50.208" N, 02°08'27.624" E	深海盆地	/	/
30/14-1 ^[99]	北海盆地	56°33'37" N, 2°38'08" E	深海盆地	/	/
Fur Island ^[55]	北海盆地	56°49'51" N, 8°58'45" E	浅海	缺氧 ^[100] (生物标志化合物)	CIE 期间
E-8X ^[56]	北海盆地	55°38'13.42" N, 04°59'11.96" E	深海盆地	硫化 ^[21] (Mo 同位素)	CIE 起始—主体期间

BH09/2005 ^[55]	北冰洋	77°54'09" N, 16°12'59" E	近岸盆地	缺氧 ^[101] (Th/U)	CIE 期间
ACEX ^[55]	北冰洋	87°52'12" N, 136°12'41" E	浅海近岸 ^[102] (0~200 m)	硫化 ^[102] (Mo 同位素)	CIE 主体阶段
Zumaia ^[98]	比利牛斯前陆盆地	43°18'4.5" N, 02°15'31.2" W	深海盆地 ^[103] (1 000 m)	缺氧 ^[103] (遗迹化石)	CIE 期间
Lussagnet ^[98]	比利牛斯前陆盆地	43°46'4" N, 00°13'12" W	浅海 (碳酸岩台地)	/	/
Serraduy ^[98]	比利牛斯前陆盆地	42°19'25" N, 00°34' 20' E	冲积平原—海岸平原	/	/
Esplugafreda ^[98]	比利牛斯前陆盆地	42°14'50" N, 00°45'13" E	冲积平原	/	/
Ancora ^[99]	美国东部新泽西州	39°41'32" N, 74°50'56" W	大陆架 ^[104] (110 m)	缺氧 ^[105] (底栖有孔虫)	CIE 起始—主体期间
Wilson Lake ^[99]	美国东部新泽西州	39°39'21" N, 75°02'52" W	大陆架 ^[104] (90 m)	缺氧 ^[106] (氧化还原敏感细菌)	CIE 期间
Bass River ^[55]	美国东部新泽西州	39°36'42" N, 74°26'12" W	大陆架 ^[104] (145 m)	缺氧 ^[105] (底栖有孔虫)	CIE 起始—主体期间
Millville ^[97]	美国东部新泽西州	39°24'0.00" N, 75°4'48.00" W	大陆架 ^[104] (120 m)	/	/
Blake Nose ^[97]	北大西洋	30°03.1860' N, 76°21.4712' W	深海 (1 500 m)	/	/
Dababiyah ^[96]	埃及	25°30' N, 32°31' E	浅海 (150~175 m)	缺氧 ^[107] (氧化还原敏感元素)	CIE 主体阶段
1262 ^[99]	南大西洋	27°11'9" S, 1°34'37" E	深海 ^[108] (3 600 m)	次氧化 ^[108] (Mn _{EF})	CIE 开始约 80 kyr

3.1 汞的赋存情况

沉积物中 Hg 主要赋存于有机物、硫化物、黏土矿物等矿物相。Hg 含量与表示赋存相的总有机碳 (TOC) 含量、总硫 (TS) 含量、铝 (Al) 含量、铁 (Fe) 含量及锰 (Mn) 含量进行标准化 (计算汞/赋存相比值)，可以评估沉积物中的 Hg 富集程度及其异常机制探究 [51-52,109-110]。此外，Hg 与 TOC、TS、Al、Fe 和 Mn 之间的相关性强度可以用来表示 Hg 的主要赋存相。

不同沉积环境 (氧化还原变化) 会影响 Hg 的循环和赋存矿物相。在氧化条件下，有机质通常是地质历史时期和现代海相或湖相沉积物中较为重要的赋存相，其主要以 Hg-OM 络合物形式存在^[87,111]。在这种情况下，沉积记录中的汞浓度通常需要与沉积物中的总有机碳 (TOC) 含量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后 Hg/TOC 高值可以排除有机质增加导致的沉积物中汞赋存增加的情况，从而可以作为指示火山活动的指标^[112]，但当 TOC<0.2 wt% 时，Hg/TOC 比值不再适用^[51]。在大部分 PETM 站点中，前人只报道了 Hg 和 TOC 的数据，且在大部分地点两者呈适中至较强的相关性 (图 5)，而 Zumaia、Lussagnet、Serraduy、Esplugafreda、

Black Nose 等研究区域记录大部分样品的 TOC<0.2 wt%, 使得 Hg/TOC 的值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 PETM 时期, Bass River 地区处于缺氧环境^[105], 且 Bass River 剖面的 Hg 与 TOC 相关性较差, 不能简单地将其赋存矿物认定为有机物。位于深海盆地环境的 25/11-17 站点, 汞与总有机碳之间的相关性较弱, 且不显著, 可能与钻孔中汞浓度极高有关^[99]。此外, 在缺氧及硫化条件下, Hg 可能会逃逸, 使得沉积物中的 Hg 信号减弱, 此外水体中存在游离的硫化物, 汞更有可能通过形成汞—硫化物络合物或被铁硫化物吸收的方式与硫化物相结合^[113], 从而使汞吸附在硫化物之中^[52,114], 如位于北海盆地的深海盆地 23/16b-9 (图 5), Hg 与 TS 的相关性较高, 但标准化后的 Hg/TOC 与 Hg/TS 呈相同的变化趋势, 有机物和硫化物可能都为 Hg 的赋存相。在静海环境下, 局部地区黄铁矿埋藏增加, 可能会导致局部汞含量下降^[51,109]。在有机质和硫化物含量较低的情况下, 由于黏土矿物具有较高的表面反应性, 汞也会吸附在黏土矿物表面^[84,115-116], 位于新泽西州的大陆架 Ancora 和 Wilson Lake 剖面(图 5)。在氧化环境中的铁锰氧化物也可能吸附汞^[52,117-118], 如 30/14-1 和 1262 (图 5)。除此之外, ACEX 站点较为特殊, 其在 PETM 时期为缺氧—硫化环境^[102], 处于浅海近岸环境, 沉积物中的 Hg 与 TOC、Al 等元素相关性较差, 不能确定其赋存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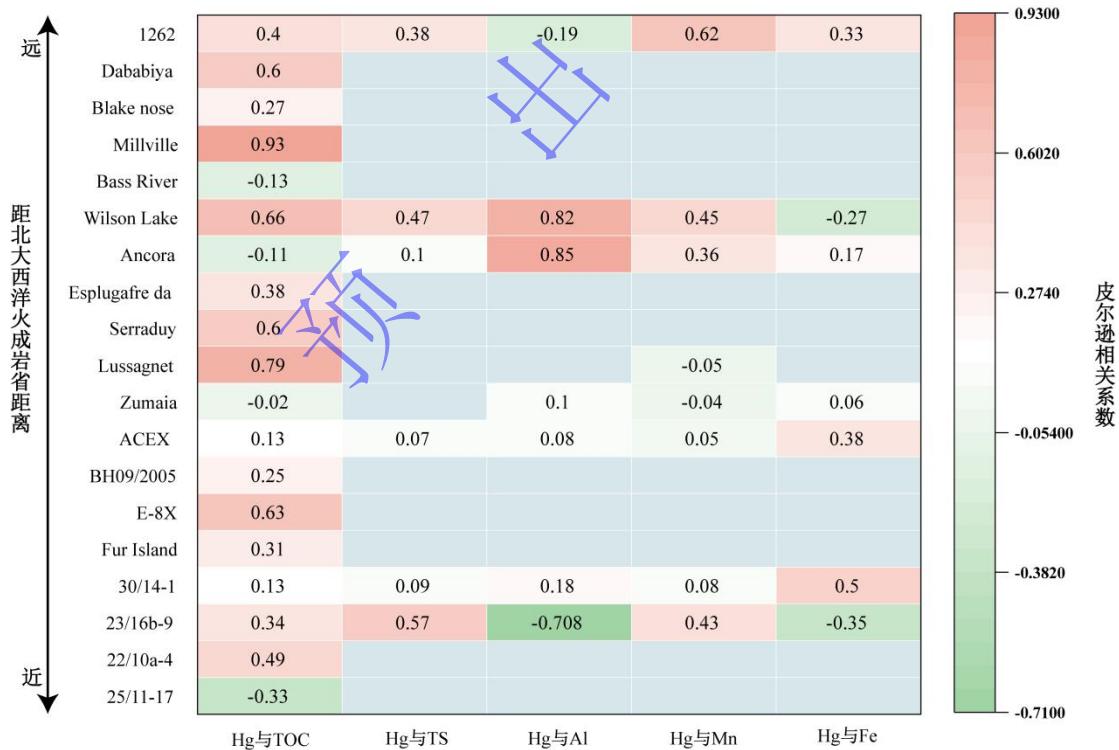


图 5 研究点位沉积汞的主要赋存相分析

图中数字为皮尔逊相关系数, 红色和绿色分别代表正相关与负相关, 数据来自文献[99]

Fig.5 Dominant host phases of Hg at the study site

The numbers are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red. positive correlation; green. negative correlation); data from reference [99]

3.2 PETM 时期汞富集记录

3.2.1 邻近 NAIP 地区汞富集纪录

依据 Jin *et al.*^[99]将北海盆地、北极和比利牛斯前陆盆地等地划分为邻近 NAIP 地区（距 NAIP 4 000 km 以内）。位于北海盆地的 25/11-17、22/10a-4、23/16b-9 在 PETM 期间主要以泥岩与砂岩沉积为主^[44,55,119]，而 E-8X（北海盆地）与丹麦北部的 Fur Island 剖面以泥岩与火山灰层互层沉积为主^[55-56]。ACEX 钻孔位于北冰洋中部的罗蒙诺索夫海岭，其主要岩性为富含有机物的泥岩^[99]。钻孔 BH09/2005 位于斯瓦尔巴群岛的中央盆地，以页岩沉积为主，在古新世—始新世期间陆源碎屑输入增加^[120]。Zumaia、Lussagnet、Serraduy、Esplugafreda 位于比利牛斯前陆盆地，Serraduy、Esplugafreda 为陆相剖面，主要以粉砂质泥岩沉积为主^[98]。Zumaia、Lussagnet 在 PETM 时期处于海洋环境，其中 Lussagnet 地区主要为灰岩沉积，在 PETM 时期可见陆源输入的砂岩及泥岩扰乱 Lussagnet 的碳酸盐岩沉积^[98]；Zumaia 在 PETM 前后以泥灰岩与灰岩互层沉积为主，在 PETM 时期转变为泥岩，说明在此期间陆地径流增加^[121]。

在碳同位素负漂（CIE）开始之前，北海盆地及北冰洋的钻孔（22/10a-4、23/16b-9、E-8X、Fur Island、BH09/2005、ACEX）Hg 浓度及 Hg/TOC（Hg/TS）值开始剧烈波动，整体上高于背景值（图 6）。在 Zumaia、Lussagnet、Esplugafreda 等研究区域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Hg 异常。随后在 CIE 期间，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 Hg 的异常。在 CIE 之后，仅有 23/16b-9、BH09/2005、E-8X 存在 Hg 异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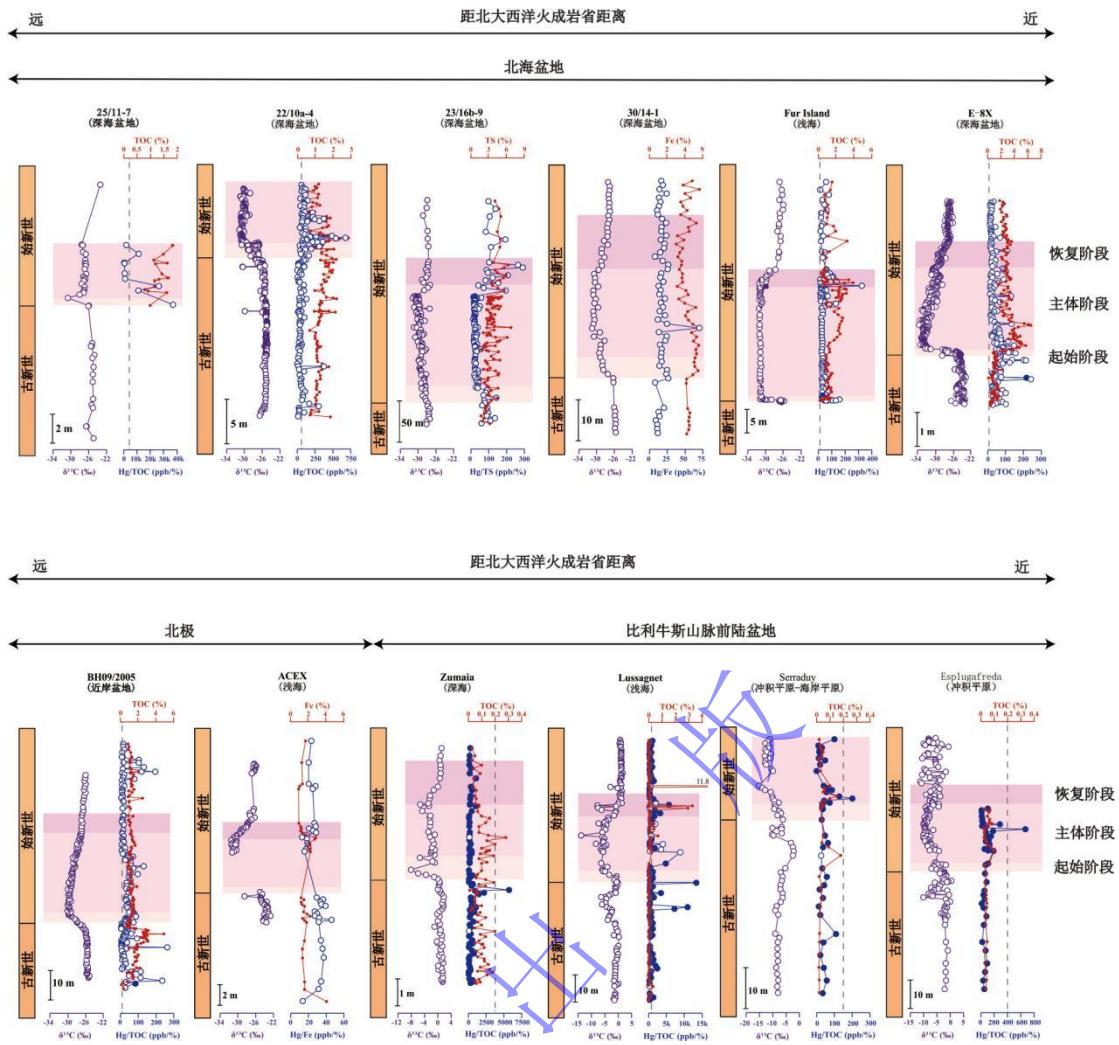


图 6 PETM 事件邻近 NAIP 地区的碳同位素、汞浓度及 TOC (TS, Fe) 数据

虚线表示 $\text{TOC}=0.2 \text{ wt.\%}$ ^[51], 25/11-17、Fur Island、BH09/2005、AECX 的数据来自文献[55]; 22/10a-4、E-8X 数据来自文献[56,119];

23/16b-9 数据来自文献[44]; 30/14-1 数据来自文献[99]; Zumaia、Lussagnet、Serraduy、Esplugafreda 数据来自文献[98]

Fig.6 Carbon isotope, Hg concentration and TOC (TS, Fe) data from neighboring NAIP areas during the PETM
Dashed lines indicate $\text{TOC}=0.2 \text{ wt.\%}$ ^[51]. Data for 25/11-17, Fur Island, BH09/2005, AECX from reference [55]; 22/10a-4, E-8X data from references [56,119]; 23/16b-9 data from reference [44]; 30 /14-1 data from reference [99]; Zumaia, Lussagnet, Serraduy, Esplugafreda data from reference [98]

3.2.2 远离 NAIP 地区汞富集记录

位于新泽西沿海平原的 Bass River、Wilson Lake、Ancora 在 PETM 之前以富含海绿石的砂岩沉积为主, Wilson Lake 在 PETM 期间粒径逐渐变细转化为泥岩(从中—细砂, 到粉砂, 再转变至黏土), 而 Bass River、Ancora 地区没有这种过渡段沉积记录^[105]。Millville (新泽西沿海平原) 以富含有机质的粉砂岩沉积为主^[97]。位于北大西洋的 Blake Nose 钻孔主要岩性为富含碳酸盐岩的远洋沉积物^[97]。ODP 1262 (南大西洋) 在 PETM 事件发生期间由碳酸盐岩突变为泥岩^[99]。位于埃及的 Dababiya 在 PETM 期间主要由泥灰岩及灰质页岩转变为含磷结核的泥灰岩^[122]。

CIE 之前, Wilson Lake、Ancora、Millville、Dababiya 及 Blake Nose 地区的 Hg 浓度相对较低(图 7),而在 CIE 期间 Hg 含量保持相对较高,然后下降至 CIE 之前的值,而 Bass River 地区是在 CIE 之后 Hg 含量升高。1262 钻孔 Hg 浓度在整个 PETM 区间变化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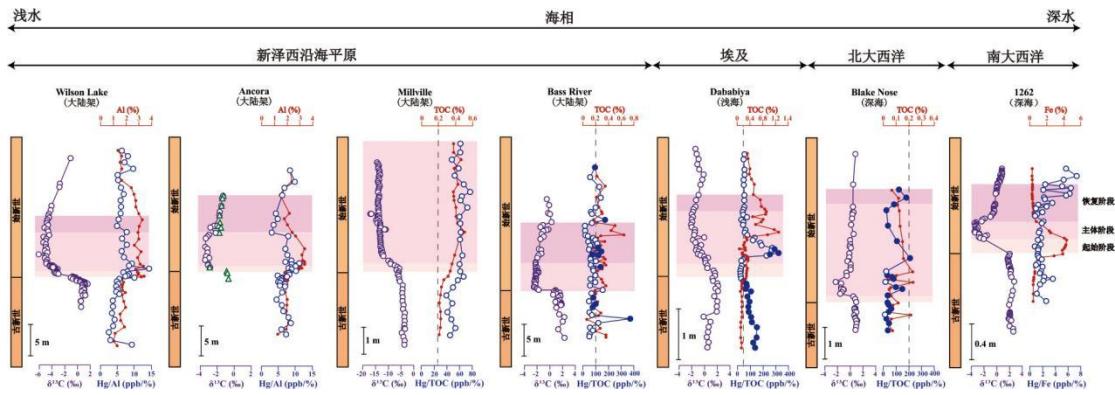


图 7 PETM 事件远离 NAIP 地区的碳同位素、汞浓度及 TOC (Al、Fe) 数据

虚线表示 $\text{TOC}=0.2 \text{ wt.\%}$ ^[51], 其中 Wilson Lake、Ancora、1262 的汞、Al、Fe 数据来自文献^[99]; Bass River 的汞及 TOC 数据来自文献^[55]; Millville、Blake Nose 的汞及 TOC 数据来自文献^[97]; Dababiya 的碳同位素、汞及 TOC 数据来自文献^[96]; Ancora 的碳同位素数据来自文献^[105]; Millville、Wilson Lake 的碳同位素数据来自文献^[123]; Bass River 的碳同位素数据来自文献^[20]; Blake Nose 的碳同位素数据来自文献^[86]; 1262 的碳同位素数据来自文献^[11]

Fig.7 C isotope, Hg concentration and TOC (Al, Fe) data for PETM remote from the NAIP area

Dashed lines indicate $\text{TOC}=0.2 \text{ wt.\%}$ ^[51]. Hg, Al, Fe data for Wilson Lake, Ancora and 1262 from reference [99]; Hg and TOC data for Bass River from reference [55]; Hg and TOC data for Millville and Blake Nose from reference [97]; C isotope, Hg and TOC data for Dababiya from reference [96]; C isotope data for Ancora from reference [105]; for Millville, Wilson Lake from reference [123]; for Bass River from reference [20]; for Blake Nose from reference [86]; for 1262 from reference [11]

3.3 汞富集的影响因素

汞浓度异常的产生往往归因于沉积物中汞含量的增加^[52,124]。然而,并不能够轻易将沉积物中汞浓度的增加解释为火山活动的结果^[109,125]。沉积物中汞浓度变化受到多个因素的控制,如陆源输入、火山排放、海水氧化还原等^[126]。PETM 时期各个地区沉积物中汞浓度变化的模式不同,这可能与上述影响因素有关。

3.3.1 火山来源

北大西洋火成岩省的火山活动主要通过火山喷发及热液喷口复合体的喷发来影响汞循环。火山喷发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为苏特赛式 (Surtseyan-type) 喷发,这种喷发方式以在浅海海底的一个火山口反复爆发式喷发为特征,当玄武质岩浆与海水接触时会再次发生爆炸,产生大量细粒物质 (火山灰),此时会释放出 CO_2 、Hg 等挥发性物质至大气,也会有部分 Hg 会保留在海水之中^[55];第二种为玄武岩溢流式喷发,即岩浆沿一个方向的大断裂(裂隙)或断裂群上升,喷出地表,此时 CO_2 、Hg 会随之释放至大气之中。而热液喷口复合体则是由岩浆侵入至有机质盆地,在其边缘位置所形成的。热液喷口复合体的喷发会将 Hg 等

挥发性组分传输到海洋之中, CO_2 、 CH_4 及部分 Hg 也会随之被释放至大气系统^[55]。

上述两种方式都会对汞富集模式产生影响, 火山的间接性喷发可能形成单个的汞/赋存相比值峰值, 如 30/14-1 钻孔在 CIE 期间仅存在一个异常峰值, 这可能为火山间接性喷发所导致的。而连续喷发可能会使汞/赋存相比值持续异常(如 E-8X、Fur Island、BH09/2005 等)。在 CIE 之前, Fur Island 地区 Hg 异常峰值出现的层位与地层记录中的 NAIP 火山灰层相对应^[55], E-8X 钻孔内也存在少量薄层火山灰的沉积记录^[56]。在这一阶段, BH09/2005 钻孔 Hg 异常峰值与 $^{187}\text{Os}/^{188}\text{Os}$ 比值大幅下降^[67]相对应。这说明 PETM 开始之前, NAIP 连续喷发所释放的汞可能已部分注入至附近的海水中, 从而使得 NAIP 邻近海域沉积记录中的汞浓度出现异常。NAIP 的连续喷发也会向大气注入大量 CO_2 , 从而促使 PETM 事件的发生。在 CIE 恢复阶段, Fur Island 地区汞富集层位与多层火山灰层位相对应^[55], 说明在此期间 NAIP 也发生了火山活动。

热液喷口复合体产生的汞异常变化主要表现为在岩浆侵入后出现较大的汞/赋存相比值异常, 由此产生的汞异常可能是区域性的, 如 25/11-17 站点报道的特殊 Hg 异常值 ($\text{Hg/TOC}=95700 \mu\text{g/kg}$)。Jones *et al.*^[55]认为这可能是由于热液喷口复合体喷发致使大部分 Hg 转移到水体中, 导致局部 Hg 浓度升高, 但该钻孔缺少岩心记录, PETM 阶段划分不确定, 且有油砂沉积, 油气迁移也可能导致地层中汞分布不均匀^[55], 因此, 并不能简单地将其解释为热液喷口复合体喷发。

3.3.2 陆源输入

在深海环境中, 沉积物中的 Hg 主要来自大气的直接沉降。大陆环境中, 火山活动释放的 Hg 通过降雨直接沉积在土壤之中或被植物叶片吸收。相比之下, 在浅海近岸环境中, 沉积物中的 Hg 既可以来源于大气沉降, 也可以来源于陆源输入, 从而使得浅海近岸环境中的汞富集程度高于深水环境^[52]。位于比利牛斯前陆盆地的 Lussagnet 剖面在 PETM 时期主要为浅海近岸环境, PETM 之前主要以碳酸盐岩沉积为主, 在 PETM 时期可见陆源输入的砂岩及泥岩扰乱碳酸盐岩沉积^[98], 可能有大量的汞从陆源输入, 从而使得 Lussagnet 地区汞富集程度远高于邻近地点深海 Zuamia 剖面及陆相 Serraduy、Esplugafreda 剖面^[98]。此外, Zuamia 剖面在 PETM 时期岩性由灰岩转变为泥岩, 可能是区域水循环加强所致陆地径流增多^[121], 从而使 PETM 期间 Hg 含量增加。BH09/2005、ACEX 及新泽西沿海平原等研究区域在 PETM 时期也处于浅海近岸的沉积环境, 有证据证明上述研究区域在 PETM 期间陆地径流增多^[20,107,120,127], 陆源输入增多, 使得在 PETM 期间 BH09/2005、Wilson Lake、Ancora、Dababiya 研究区域沉积物中的 Hg 浓度升高。在 PETM 时期, 北海处于局限盆地环境, 在 CIE 主体阶

段，钻孔 22/10a-4 的 C/N 比值及古生物变化可指示陆源输入增多^[119]，与此同时，邻近钻孔 E-8X 钻孔沉积了少量薄层火山灰^[56]，说明在 CIE 期间 22/10a-4 的 Hg 异常可能为火山输入与陆地径流混合形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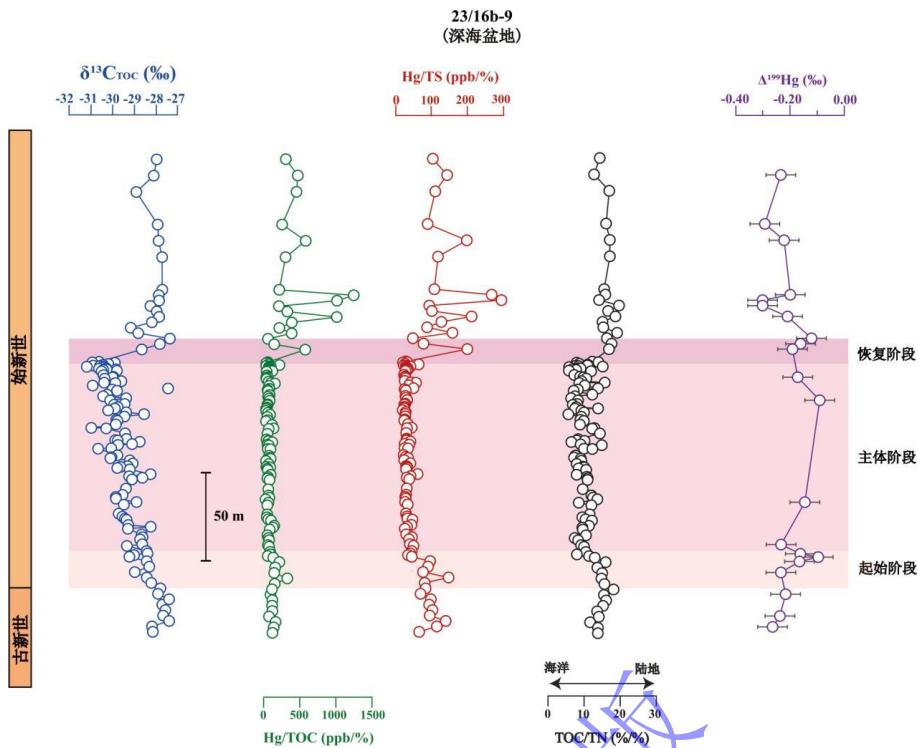
因此，不能将浅海近岸环境沉积物中汞异常简单地解释为火山来源，需借助其他指标进一步研究。

3.4 汞同位素的记录

仅根据沉积物中汞元素浓度来追踪火山活动记录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汞同位素可以有效地示踪沉积物中汞元素的来源（汞同位素示踪汞来源原理见上文）。迄今为止，PETM 只有两个研究地区测定了汞同位素数据^[44,128]，其中 AECX 地区仅报道了一个汞同位素数据点^[128]。

在 23/16b-9 站点， $\Delta^{199}\text{Hg}$ 的变化范围为-0.3‰至-0.09‰（图 8）^[44]。在 PETM 开始之前 Hg/TS 值出现峰值（从 60.35 μg/kg 至 134.65 μg/kg）， $\Delta^{199}\text{Hg}$ 为负值，趋于-0.3‰，结合邻近钻孔 22/10a-4 *Cerodinium depressum* 和 *Senegalinium spp.* 丰度变化，表明在 PETM 开始之前，北海盆地地表水盐度降低和营养水平升高，陆源输入有所增加^[119]，使得 23/16b-9 站点沉积了大量陆源输入的汞，从而使 CIE 之前的 $\Delta^{199}\text{Hg}$ 为负值。在 CIE 起始阶段， $\Delta^{199}\text{Hg}$ 发生正偏趋于 0，23/16b-9 站点在此期间出现两次 Hg/TS 峰值， $\Delta^{199}\text{Hg}$ 在第一次峰值出现后开始正偏。与此同时，北海盆地邻近站点 E-8X、22/10a-4、30/14-1 及斯瓦尔巴群岛的 BH09/2005 钻孔也出现汞异常峰值，说明火山 Hg 输入短暂增加。此外，Os 同位素数据也可为这一阶段火山活动的爆发提供证据^[68]。在 CIE 恢复阶段，Hg 浓度与 Hg/TS 值出现峰值， $\Delta^{199}\text{Hg}$ 值发生正偏，表明在此阶段可能存在火山活动。同时，TOC/TN 比值也有所升高，说明陆源输入有机质增多^[129]，这可能反映火山来源 Hg 多于陆地输入的 Hg。而 CIE 过后， $\Delta^{199}\text{Hg}$ 开始负偏且有 Hg 峰值的出现，TOC/TN 比值与 CIE 恢复阶段变化不大，说明这一阶段的 Hg 可能来源于陆地输入，或为火山来源 Hg 少于陆地输入的 Hg。此外，岩浆侵入至富有机质沉积物所释放的汞也可能呈现负的 $\Delta^{199}\text{Hg}$ ^[126]，但在 23/16b-9 站点缺乏与 PETM 时期相对应的热液喷口沉积记录。因此，23/16b-9 站点汞同位素仅能确定 CIE 起始阶段的 Hg 为火山来源，但无法确定负 $\Delta^{199}\text{Hg}$ 值所指示 Hg 的确切来源。

此外，PETM 碳同位素负偏主体阶段，23/16b-9 汞浓度的变化与汞同位素波动不能完全对应。在主体阶段，23/16b-9 的 Hg 浓度与 Hg/TS 值基本保持不变，且 TOC/TN 比值无明显下降趋势，但 $\Delta^{199}\text{Hg}$ 发生正偏，已有的数据不能完全解释在此阶段 $\Delta^{199}\text{Hg}$ 的变化^[44]。归根结底，仅凭单个研究区域的汞同位素数据很难区分汞的确切来源。

图 8 23/16b-9 钻孔有机碳同位素、Hg/TOC、Hg/TS、TOC/TN、 $\Delta^{199}\text{Hg}$ 数据图（数据来自文献[44]）Fig.8 Organic carbon isotopes, Hg/TOC, Hg/TS, TOC/TN and $\Delta^{199}\text{Hg}$ (data from 23/16b-9 reference [44])

4 存在问题

利用汞富集及其同位素示踪 PETM 时期 NAIP 的火山活动，可以为探究大火成岩省与 PETM 之间因果关系提供有力证据。现有的工作发现沉积物中汞的富集情况主要呈空间分布且受沉积环境影响，与 NAIP 距离越近，汞富集程度越高，这支持了汞富集事件与 NAIP 火山活动之间的联系^[55-56,98]。此外，已发表的汞同位素数据也为 PETM 期间存在火山活动提供了证据^[44]。但目前仍存在许多未解决的问题。

1) 使用汞浓度及汞同位素指示古火山活动

对于大部分站点，研究人员仅用汞与总有机碳标准化，没有考虑氧化还原等条件的影响。而沉积物中汞的含量变化会受到陆源输入、火山排放、氧化还原条件及汞的赋存情况等的影响。仅考虑汞赋存于有机质的情况可能会低估了汞的富集程度。除此之外，仅有少部分研究站点有火山灰或 Os 同位素等证据证明汞为火山来源^[55,97]。但并非所有的汞富集都来自火山的输入，仅根据沉积物中汞元素浓度不能确定汞元素的来源。此外，汞同位素示踪 PETM 时期沉积物中汞元素的来源仍存在很多问题。前人研究将接近于零的 $\Delta^{199}\text{Hg}$ 值解释为火山来源^[44]。但对于负 $\Delta^{199}\text{Hg}$ 值的解释还存在争议，在陆地体系（土壤、植被和沉积物）中 $\Delta^{199}\text{Hg}$ 值主要以负值为主^[92]，而岩浆侵入富有机质盆地发生接触热变质作用时， $\Delta^{199}\text{Hg}$ 值也可能偏负^[126]，所以在使用汞元素及其汞同位素示踪火山时，需从多方面进行考虑。

2) 对 NAIP 侵位的认识尚不明确

目前的研究认为 NAIP 发生的剧烈岩浆活动, 火山去气或岩浆侵入到富含有机质的沉积物中, 向大气释放了大量温室气体 (CO_2 、 CH_4), 导致全球范围的持续升温, 使得碳循环系统不稳定性增加, 最终突破系统临界点, 诱发巨量还原性碳库(天然气水合物、冻土)分解释放, 从而使得 PETM 事件的发生^[56]。但靠汞含量及汞同位素仅能为北大西洋火成岩省的火山活动与 PETM 存在时间联系提供证据, 尚不能确定轻碳的来源及北大西洋火成岩省的侵位机制。

3) 缺乏全球范围的研究

想要了解确认北大西洋火成岩省的喷发规模及火山活动强度, 需要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沉积相背景下对全球范围展开研究。目前已发表的汞数据主要集中在靠近 NAIP 喷发区域的北半球, 特别是汞同位素数据相对较少, 部分地区汞富集的时期与已有的汞同位素所指示的不完全相同。此外沉积汞研究区域较为局限, 主要集中于邻近 NAIP 的浅海或深海盆地之中。还需要对全球范围内其他沉积环境(如开阔海环境及陆地环境)地区展开汞含量及其同位素研究。

5 结论与未来展望

总的来说, 对于 PETM 时期沉积物中 Hg 元素记录和火山活动的关系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仅靠 Hg 元素含量变化不能准确地示踪火山活动记录, 需要借助汞同位素和其他指标综合示踪火山活动记录。此外还需借助地球系统模型等工具来定量研究汞同位素所指示的火山活动的碳排放量, 以便进一步研究火山活动对气候环境变化的影响, 从而更好地预估地球未来气候变化趋势。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Climate change 2022-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Working group II contribution to the six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M].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 [2] Le Quéré C, Andrew R M, Friedlingstein P, et al. Global Carbon Budget 2018[J]. Earth System Science Data, 2018, 10(4): 2141-2194.
- [3] Cui Y, Li M S, van Soelen E E, et al. Massive and rapid predominantly volcanic CO_2 emission during the end-Permian mass extinction[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21, 118(37): e2014701118.
- [4] McElwain J C, Wade-Murphy J, Hesselbo S P. Changes in carbon dioxide during an oceanic anoxic event linked to intrusion into Gondwana coals[J]. Nature, 2005, 435(7041): 479-482.
- [5] Adloff M, Greene S E, Parkinson I J, et al. Unravelling the sources of carbon emissions at the onset of Oceanic Anoxic Event (OAE) 1a[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20, 530: 115947.

- [6] Kuroda J, Ogawa N O, Tanimizu M, et al. Contemporaneous massive subaerial volcanism and late cretaceous Oceanic Anoxic Event 2[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07, 256(1/2): 211-223.
- [7] Foster G L, Hull P, Lunt D J, et al. Placing our current 'hyperthermal'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climate change in our geological past[J].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A: Mathematical, Physical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 2018, 376(2130): 20170086..
- [8] Gutjahr M, Ridgwell A, Sexton P F, et al. Very large release of mostly volcanic carbon during the Pala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J]. *Nature*, 2017, 548(7669): 573-577.
- [9] McInerney F A, Wing S L.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A perturbation of carbon cycle, climate, and biosphere with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J]. *Annual Review of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s*, 2011, 39(1/2): 489-516.
- [10] Zachos J C, Dickens G R, Zeebe R E. An early Cenozoic perspective on greenhouse warming and carbon-cycle dynamics[J]. *Nature*, 2008, 451(7176): 279-283.
- [11] Zachos J C, McCarren H, Murphy B, et al. Tempo and scale of late Paleocene and early Eocene carbon isotope cycles: Implications for the origin of hyperthermals[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10, 299(1/2): 242-249.
- [12] Dickens G R, O'neil J R, Rea D K, et al. Dissociation of oceanic methane hydrate as a cause of the carbon isotope excursion at the end of the Paleocene[J]. *Paleoceanography and Paleoclimatology*, 1995, 10(6): 965-971.
- [13] Zeebe R E, Lourens L J. Solar System chaos and the Paleocene-Eocene boundary age constrained by geology and astronomy[J]. *Science*, 2019, 365(6456): 926-929.
- [14] Westerhold T, Röhl U, Frederichs T, et al. Astronomical calibration of the Ypresian timescale: implications for seafloor spreading rates and the chaotic behavior of the solar system?[J]. *Climate of the Past*, 2017, 13(9): 1129-1152.
- [15] Murphy B H, Farley K A, Zachos J C. An extraterrestrial ^3He -based timescale for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PETM) from Walvis Ridge, IODP Site 1266[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10, 74(17): 5098-5108.
- [16] Röhl U, Westerhold T, Bralower T J, et al. On the duration of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PETM)[J]. *Geochemistry, Geophysics, Geosystems*, 2007, 8(12): Q12002.
- [17] Tierney J E, Zhu J, Li M S, et al. Spatial patterns of climate change across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22, 119(42): e2205326119.
- [18] Miller K G, Browning J V, Schmelz W J, et al. Cenozoic sea-level and cryospheric evolution from deep-sea geochemical and continental margin records[J]. *Science Advances*, 2020, 6(20): eaaz1346.
- [19] Zachos J, Pagani M, Sloan L, et al. Trends, rhythms, and aberrations in global climate 65 Ma to present [J]. *Science*, 2001, 292(5517): 686-693.
- [20] John C M, Bohaty S M, Zachos J C, et al. North American continental margin records of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carbon and hydrological cycling[J]. *Paleoceanography and Paleoclimatology*, 2008, 23(2): PA2217.
- [21] Mariani E, Kender S, Hesselbo S P, et al. Large Igneous Province Control on Ocean Anoxia and Eutrophication in the North Sea at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J]. *Paleoceanography and Paleoclimatology*, 2024, 39(4): e2023PA004756.
- [22] Sluijs A, Brinkhuis H, Schouten S, et al. Environmental precursors to rapid light carbon injection at the Palaeocene/Eocene boundary[J]. *Nature*, 2007, 450(7173): 1218-1221.
- [23] Alegret L, Ortiz S. Global extinction event in benthic foraminifera across the Paleocene Eocene boundary at the Dababiya Stratotype section[J]. *Micropaleontology*, 2006, 52(5): 433-447.
- [24] Gingerich P D. Environment and evolution through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J]. *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 2006, 21(5): 246-253.
- [25] Thomas E. Development of Cenozoic deep-sea benthic foraminiferal faunas in Antarctic waters[M]//Crame J A. *Proceedings of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the Antarctic biota*. London: Geological Society, London, Special Publications, 1989, 47: 283-296.
- [26] Lowery C M, Bown P R, Fraass A J, et al. Ecological response of plankton to environmental change: thresholds for extinction[J]. *Annual Review of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s*, 2020, 48: 403-429.
- [27] Sluijs A, Brinkhuis H, Crouch E M, et al. Eustatic variations during the Paleocene-Eocene greenhouse world[J]. *Paleoceanography*

- and Paleoclimatology, 2008, 23(4): PA4216.
- [28] Schmitz B, Pujalte V. Abrupt increase in seasonal extreme precipitation at the Paleocene-Eocene boundary[J]. Geology, 2007, 35(3): 215-218.
- [29] Carmichael M J, Inglis G N, Badger M P S, et al. Hydrological and associated biogeochemical consequences of rapid global warming during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J]. Global and Planetary Change, 2017, 157: 114-138.
- [30] Zachos J C, Röhl U, Schellenberg S A, et al. Rapid acidification of the ocean during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J]. Science, 2005, 308(5728): 1611-1615.
- [31] Yao W Q, Paytan A, Wortmann U G. Large-scale ocean deoxygenation during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J]. Science, 2018, 361(6404): 804-806.
- [32] Dickens G R. Down the Rabbit Hole: toward appropriate discussion of methane release from gas hydrate systems during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and other past hyperthermal events[J]. Climate of the Past, 2011, 7(3): 831-846.
- [33] Gu G S, Dickens G R, Bhatnagar G, et al. Abundant Early Palaeogene marine gas hydrates despite warm deep-ocean temperatures[J]. Nature Geoscience, 2011, 4(12): 848-851.
- [34] DeConto R M, Galeotti S, Pagani M, et al. Past extreme warming events linked to massive carbon release from thawing permafrost[J]. Nature, 2012, 484(7392): 87-91.
- [35] Lourens L J, Sluijs A, Kroon D, et al. Astronomical pacing of late Palaeocene to early Eocene global warming events[J]. Nature, 2005, 435(7045): 1083-1087.
- [36] Li M S, Bralower T J, Kump L R, et al. Astrochronology of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on the Atlantic Coastal Plain[J].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2, 13(1): 5618.
- [37] Piedrahita V A, Galeotti S, Zhao X, et al. Orbital phasing of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22, 598: 117839.
- [38] Kent D V, Cramer B S, Lanci L, et al. A case for a comet impact trigger for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and carbon isotope excursion[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03, 211(1/2): 13-26.
- [39] Cramer B S, Kent D V. Bolide summer: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as a response to an extraterrestrial trigger [J].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2005, 224(1/2/3): 144-166.
- [40] Schaller M F, Fung M K, Wright J D, et al. Impact ejecta at the Paleocene-Eocene boundary[J]. Science, 2016, 354(6309): 225-229.
- [41] Svensen H, Planke S, Malthe-Sørensen A, et al. Release of methane from a volcanic basin as a mechanism for initial Eocene global warming[J]. Nature, 2004, 429(6991): 542-545.
- [42] Storey M, Duncan R A, Swisher C C.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and the opening of the northeast Atlantic[J]. Science, 2007, 316(5824): 587-589.
- [43] Storey M, Duncan R A, Tegner C. Timing and duration of volcanism in the North Atlantic Igneous Province: Implications for geodynamics and links to the Iceland hotspot[J]. Chemical Geology, 2007, 241(3/4): 264-281.
- [44] Jin S M, Kemp D B, Yin R S, et al. Mercury isotope evidence for protracted North Atlantic magmatism during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23, 602: 117926.
- [45] Berndt C, Planke S, Alvarez Zarikian C A, et al. Shallow-water hydrothermal venting linked to the Pala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J]. Nature Geoscience, 2023, 16(9): 803-809.
- [46] Jones S M, Hoggett M, Greene S E, et al. Large Igneous Province thermogenic greenhouse gas flux could have initiated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climate change[J].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9, 10: 5547.
- [47] Matsumoto H, Coccioni R, Frontalini F, et al. Long-term Aptian marine osmium isotopic record of Ontong Java Nui activity[J]. Geology, 2021, 49(9): 1148-1152.
- [48] Westerhold T, Marwan N, Drury A J, et al. An astronomically dated record of Earth's climate and its predictability over the last 66 million years[J]. Science, 2020, 369(6509): 1383-1387.
- [49] Hu D P, Li M H, Zhang X L, et al. Large mass-independent sulphur isotope anomalies link stratospheric volcanism to the Late

- Ordovician mass extinction[J].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0, 11(1): 2297.
- [50] Li R C, Shen S Z, Xia X P, et al. Atmospheric ozone destruction and the end-Permian crisis: Evidence from multiple sulfur isotopes[J]. *Chemical Geology*, 2024, 647: 121936.
- [51] Grasby S E, Them T R, Chen Z H, et al. Mercury as a proxy for volcanic emissions in the geologic record[J]. *Earth-Science Reviews*, 2019, 196: 102880.
- [52] Shen J, Feng Q L, Algeo T J, et al. Sedimentary host phases of mercury (Hg) and implications for use of Hg as a volcanic proxy[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20, 543: 116333.
- [53] Shen J, Yin R S, Zhang S, et al. Intensified continental chemical weathering and carbon-cycle perturbations linked to volcanism during the Triassic-Jurassic transition[J].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2, 13(1): 299.
- [54] Zhou T, Pan X, Sun R Y, et al. Cryogenian interglacial greenhouse driven by enhanced volcanism: Evidence from mercury records[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21, 564: 116902.
- [55] Jones M T, Percival L M E, Stokke E W, et al. Mercury anomalies across the Pala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J]. *Climate of the Past*, 2019, 15(1): 217-236.
- [56] Kender S, Bogus K, Pedersen G K, et al. Paleocene/Eocene carbon feedbacks triggered by volcanic activity[J].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1, 12(1): 5186.
- [57] Ernst R E, Youbi N. How Large Igneous Provinces affect global climate, sometimes cause mass extinctions, and represent natural markers in the geological record[J].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2017, 478: 30-52.
- [58] [58] Saunders A D, Fitton J G, Kerr A C, et al. The North Atlantic igneous province[M]//Mahoney J J, Coffin M F. Large igneous provinces: Continental, oceanic, and planetary flood volcanism. Washington, D.C.: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1997, 100: 45-93.
- [59] Eldholm O, Thomas 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volcanic margin formation[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1993, 117(3/4): 319-329.
- [60] [60] Wilkinson C M, Ganerød M, Hendriks B W H, et al. Compilation and appraisal of geochronological data from the North Atlantic Igneous province (NAIP)[C]//Péron-Pinvidic G, Hopper J R, Funck T, et al. Proceedings of the NE Atlantic region: A reappraisal of crustal structure, tectonostratigraphy and magmatic evolution, London: Geological Society, Special Publications, 2017, 447: 69-103.
- [61] Larsen L M, Waagstein R, Pedersen A K, et al. Trans-Atlantic correlation of the Palaeogene volcanic successions in the Faeroe Islands and East Greenland[J]. *Journal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1999, 156(6) 1081-1095.
- [62] Larsen L M, Fitton J G, Pedersen A K J L. Paleogene volcanic ash layers in the Danish Basin: compositions and source areas in the North Atlantic Igneous Province [J]. *Lithos*, 2003, 71(1): 47-80.
- [63] Egger H, Brückl E. Gigantic volcanic eruptions and climatic change in the early Eocen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rth Sciences*, 2006, 95(6): 1065-1070.
- [64] Svensen H, Planke S, Corfu F. Zircon dating ties NE Atlantic sill emplacement to initial Eocene global warming[J]. *Journal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2010, 167(3): 433-436.
- [65] Frielings J, Svensen H H, Planke S, et al. Thermogenic methane release as a cause for the long duration of the PETM[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6, 113(43): 12059-12064.
- [66] Schmitz B, Peucker-Ehrenbrink B, Heilmann-Clausen C, et al. Basaltic explosive volcanism, but no comet impact, at the Paleocene–Eocene boundary: high-resolution chemical and isotopic records from Egypt, Spain and Denmark[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04, 225(1/2): 1-17.
- [67] Wieczorek R, Fante M S, Kump L R, et al. Geochemical evidence for volcanic activity prior to and enhanced terrestrial weathering during the Paleocene Eocene Thermal Maximum[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13, 119: 391-410.
- [68] Jones M T, Stokke E W, Rooney A D, et al. Tracing North Atlantic volcanism and seaway connectivity across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PETM)[J]. *Climate of the Past*, 2023, 19(8): 1623-1652.
- [69] Leavitt S W. Annual volcanic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an estimate from eruption chronologies[J]. *Environmental Geology*, 1982,

- 4(1): 15-21.
- [70] Caldeira K, Rampino M R.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from Deccan volcanism and a K/T boundary greenhouse effect[J].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1990, 17(9): 1299-1302.
- [71] Jones M T, Jerram D A, Svensen H H, et al. The effects of large igneous provinces on the global carbon and sulphur cycles[J].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2016, 441: 4-21.
- [72] Svensen H, Planke S, Jamtveit B, et al. Seep carbonate formation controlled by hydrothermal vent complexes: a case study from the Vøring Basin, the Norwegian Sea[J]. *Geo-Marine Letters*, 2003, 23(3/4): 351-358.
- [73] Heimdal T H, Svensen H H, Ramezani J, et al. Large-scale sill emplacement in Brazil as a trigger for the end-Triassic crisis[J]. *Scientific Reports*, 2018, 8(1): 141.
- [74] Schroeder W H, Munthe J. Atmospheric mercury: An overview[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1998, 32(5): 809-822.
- [75] Futsaeter G, Wilson S. The UNEP global mercury assessment: Sources, emissions and transport[C]//Proceedings of the E3S Web of Conferences, Les Ulis: EDP Sciences, 2013: 36001.
- [76] Selin N E. Global Biogeochemical Cycling of Mercury: A Review[J]. *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2009, 34: 43-63.
- [77] Varekamp J C, Buseck P R. Mercury emissions from Mount St Helens during September 1980[J]. *Nature*, 1981, 293(5833): 555-556.
- [78] Pyle D M, Mather T A. The importance of volcanic emissions for the global atmospheric mercury cycle[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3, 37(36): 5115-5124.
- [79] Selin N E, Jacob D J, Yantosca R M, et al. Global 3-D land-ocean-atmosphere model for mercury: Present-day versus preindustrial cycles and anthropogenic enrichment factors for deposition[J]. *Global Biogeochemical Cycles*, 2008, 22(2): GB2011.
- [80] Mason R P. Mercury emissions from natural processes and their importance in the global mercury cycle[M]//Mason R, Pirrone N. Mercury fate and transport in the global atmosphere: Emissions, measurements and models. Boston: Springer, 2009: 173-191.
- [81] Grasby S E, Liu X J, Yin R S, et al. Toxic mercury pulses into late Permian terrestrial and marine environments[J]. *Geology*, 2020, 48(8): 830-833.
- [82] Bergquist B A. Mercury, volcanism, and mass extinction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 114(33): 8675-8677.
- [83] Demers J D, Blum J D, Zak D R. Mercury isotopes in a forested ecosystem: Implications for air-surface exchange dynamics and the global mercury cycle[J]. *Global Biogeochemical Cycles*, 2013, 27(1): 222-238.
- [84] Kongchum M, Hudnall W H, Delaune R D. Relationship between sediment clay minerals and total mercury[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Health, Part A*, 2011, 46(5): 534-539.
- [85] Mason R P, Fitzgerald W F, Morel F M M. The biogeochemical cycling of elemental mercury: Anthropogenic influences[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1994, 58(15): 3191-3198.
- [86] Dunkley Jones T, Lunt D J, Schmidt D N, et al. Climate model and proxy data constraints on ocean warming across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J]. *Earth-Science Reviews*, 2013, 125: 123-145.
- [87] Ravichandran M. Interactions between mercury and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a review[J]. *Chemosphere*, 2004, 55(3): 319-331.
- [88] Shen J, Algeo T J, Planavsky N J, et al. Mercury enrichments provide evidence of Early Triassic volcanism following the end-Permian mass extinction[J]. *Earth-Science Reviews*, 2019, 195: 191-212.
- [89] Percival L M E, Witt M L I, Mather T A, et al. Globally enhanced mercury deposition during the end-Pliensbachian extinction and Toarcian OAE: A link to the Karoo-Ferrar Large Igneous Province[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15, 428: 267-280.
- [90] 龚清, 凌明星, 郑旺. 汞稳定同位素示踪地质记录中火山活动的应用[J]. 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 2024, 54 (5) : 1459-1483.
[Gong Qing, Ling Mingxing, Zheng Wang. Applications of mercury stable isotopes for tracing volcanism in the geologic record[J]. *Science China: Earth Sciences*, 2024, 54(5): 1459-1483.]
- [91] Bergquist B A, Blum J D. Mass-dependent and -independent fractionation of Hg isotopes by photoreduction in aquatic systems[J]. *Science*, 2007, 318(5849): 417-420.

- [92] Blum J D, Sherman L S, Johnson M W. Mercury isotopes in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J]. Annual Review of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s, 2014, 42: 249-269.
- [93] 郑旺, 赵亚秋, 孙若愚, 等. 梵的稳定同位素分馏机理[J]. 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 2021, 40(5): 1087-1116. [Zheng Wang, Zhao Yaqiu, Sun Ruoyu, et al. The mechanism of mercury stable isotope fractionation: A review[J]. Bulletin of Mineralogy, Petrology and Geochemistry, 2021, 40(5): 1087-1116.]
- [94] [94] Zambardi T, Sonke J E, Toutain J P, et al. Mercury emissions and stable isotopic compositions at Vulcano Island (Italy)[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09, 277(1/2): 236-243.
- [95] Grasby S E, Shen W J, Yin R S, et al. Isotopic signatures of mercury contamination in latest Permian oceans[J]. Geology, 2017, 45(1): 55-58.
- [96] Keller G, Mateo P, Punekar J, et al. Environmental changes during the Cretaceous-Paleogene mass extinction and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Implications for the Anthropocene[J]. Gondwana Research, 2018, 56: 69-89.
- [97] Liu Z Y, Horton D E, Tabor C, et al. Assessing the Contributions of Comet Impact and Volcanism Toward the Climate Perturbations of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J].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19, 46(24): 14798-14806.
- [98] Tremblin M, Khozyem H, Adatte T, et al. Mercury enrichments of the Pyrenean foreland basins sediments support enhanced volcanism during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PETM)[J]. Global and Planetary Change, 2022, 212.
- [99] Jin S M, Kemp D B, Shen J, et al.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global mercury enrichments through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and links to volcanism[J]. Earth-Science Reviews, 2024, 248: 104647.
- [100] Schoon P L, Heilmann-Clausen C, Schultz B P, et al. Warming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the eastern North Sea Basin during the Pala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as revealed by biomarker lipids[J]. Organic Geochemistry, 2015, 78: 79-88.
- [101] Dypvik H, Riber L, Burca F, et al.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PETM) in Svalbard: Clay mineral and geochemical signals[J].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2011, 302(3/4): 156-169.
- [102] Dickson A J, Cohen A S, Coe A L. Seawater oxygenation during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J]. Geology, 2012, 40(7): 639-642.
- [103] Rodríguez-Tovar F J, Uchman A, Alegret L, et al. Impact of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on the macrobenthic community: Ichnological record from the Zumaia section, northern Spain[J]. Marine Geology, 2011, 282(3/4): 178-187.
- [104] Wagner C L, Stassen P, Thomas E, et al. Magnetofossils and Benthic Foraminifera Record Changes in Food Supply and Deoxygenation of the Coastal Marine Seafloor During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J]. Paleoceanography and Paleoclimatology, 2022, 37(10): e2022PA004502.
- [105] Stassen P, Thomas E, Speijer R P. Integrated stratigraphy of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in the New Jersey Coastal Plain: Toward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s of global warming in a shelf environment[J]. Paleoceanography and Paleoclimatology, 2012, 27(4): PA4210.
- [106] Lippert P C, Zachos J C. A biogenic origin for anomalous fine-grained magnetic material at the Paleocene-Eocene boundary at Wilson Lake, New Jersey[J]. Paleoceanography and Paleoclimatology, 2007, 22(4): PA4104.
- [107] Schulte P, Scheibner C, Speijer R P. Fluvial discharge and sea-level changes controlling black shale deposition during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in the Dababiya Quarry section, Egypt[J]. Chemical Geology, 2011, 285(1/2/3/4): 167-183.
- [108] Chun C O J, Delaney M L, Zachos J C. Paleoredox changes across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Walvis Ridge (ODP Sites 1262, 1263, and 1266): Evidence from Mn and U enrichment factors[J]. Paleoceanography and Paleoclimatology, 2010, 25(4): 9A4202.
- [109] Shen J, Algeo T J, Chen J B, et al. Mercury in marine Ordovician/Silurian boundary sections of South China is sulfide-hosted and non-volcanic in origin[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19, 511: 130-140.
- [110] Sanei H, Grasby S E, Beauchamp B. Latest Permian mercury anomalies[J]. Geology, 2012, 40(1): 63-66.
- [111] Mazrui N M, Jonsson S, Thota S, et al. Enhanced availability of mercury bound to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for methylation in marine sediments[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16, 194: 153-162.
- [112] Grasby S E, Sanei H, Beauchamp B, et al. Mercury deposition through the Permo-Triassic Biotic Crisis [J]. Chemical Geology,

- 2013, 351: 209-216.
- [113] Bower J, Savage K S, Weinman B, et al. Immobilization of mercury by pyrite (FeS_2)[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08, 156(2): 504-514.
- [114] Han D S, Orillano M, Khodary A, et al. Reactive iron sulfide (FeS)-supported ultrafiltration for removal of mercury ($\text{Hg}(\text{II})$) from water[J]. Water Research, 2014, 53: 310-321.
- [115] Kalvoda J, Kumpan T, Qie W, et al. Mercury spikes at the Devonian-Carboniferous boundary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Rhenohercynian Zone (central Europe) and in the South China Block[J].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2019, 531: 109221.
- [116] Shen J, Yu J X, Chen J B, et al. Mercury evidence of intense volcanic effects on land during the Permian-Triassic transition[J]. Geology, 2019, 47(12): 1117-1121.
- [117] Bouffard A, Amyot M. Importance of elemental mercury in lake sediments[J]. Chemosphere, 2009, 74(8): 1098-1103.
- [118] Sánchez D M, Quejido A J, Fernández M, et al. Mercury and trace element fractionation in Almaden soils by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 sequential extraction procedures[J]. Analytical and Bioanalytical Chemistry, 2005, 381(8): 1507-1513.
- [119] Kender S, Stephenson M H, Riding J B, et al. Marine and terrestrial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NW Europe preceding carbon release at the Paleocene-Eocene transition[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12, 353-354: 108-120.
- [120] Harding I C, Charles A J, Marshall J E A, et al. Sea-level and salinity fluctuations during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in Arctic Spitsbergen [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11, 303(1/2): 97-107.
- [121] Dunkley Jones T D, Manners H R, Hoggett M, et al. Dynamics of sediment flux to a bathyal continental margin section through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J]. Climate of the Past, 2018, 14(7): 1035-1049.
- [122] Khozyem H, Adatte T, Spangenberg J E, et al. New geochemical constraints on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Dababiya GSSP, Egypt[J].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2015, 429: 117-135.
- [123] Wright J D, Schaller M F. Evidence for a rapid release of carbon at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3, 110(40): 15908-15913.
- [124] Frielings J, Mather T A, März C, et al. Effects of redox variability and early diagenesis on marine sedimentary Hg records[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23, 351: 78-95.
- [125] Them T R, Jagoe C H, Caruthers A H, et al. Terrestrial sources as the primary delivery mechanism of mercury to the oceans across the Toarcian Oceanic Anoxic Event (Early Jurassic)[J].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19, 507: 62-72.
- [126] Shen J, Yin R S, Algeo T J, et al. Mercury evidence for combustion of organic-rich sediments during the end-Triassic crisis[J].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2, 13(1): 1307.
- [127] Sluijs A, Schouten S, Pagani M, et al. Subtropical arctic ocean temperatures during the Pala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J]. Nature, 2006, 441(7093): 610-613.
- [128] Gleason J D, Blum J D, Moore T C, et al. Sources and cycling of mercury in the paleo Arctic Ocean from Hg stable isotope variations in Eocene and Quaternary sediments [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017, 197: 245-262.
- [129] Storme J Y, Dupuis C, Schnyder J, et al. Cycles of humid-dry climate conditions around the P/E boundary: new stable isotope data from terrestrial organic matter in Vasterival section (NW France) [J]. Terra Nova, 2012, 24(2): 114-122.

A Review of Mercury as Proxy for Volcanism During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YANG Chen¹, LIN WenJie¹, JIN SiMin², LI MingSong³, SHEN Jun¹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Biogeology and Environmental Geology,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China

2.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China

3. Key Laboratory of Orogenic Belts and Crustal Evolu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ol of Earth and Space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Significanc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human activities have resulted in the sustained release of greenhouse gases, including carbon dioxide (CO_2) into the atmosphere. This has been primarily driven by the combustion of fossil fuels, and threatens profound climatic disturbances, environmental transformations and widespread biological crises. Similarly,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PETM, ~56 Ma) represents a period of massive carbon release into the atmosphere, occurring at a rate strikingly comparable to current anthropogenic carbon emissions. It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gain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es and mechanisms that regulated carbon release during the PETM. Such knowledge can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impact of these emissions on the Earth's habitability. Furthermore, these findings hav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our attempts to gain an understanding of present-day and future climate change. It is consequently of the highest scientific importance to study this ancient climatic event, as it offers a natural experiment for evaluating the potential consequences of contemporary carbon emissions on global climate dynamics and ecological stability. **[Progress]** The trigger of the PETM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considerable debate among scholars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Despite extensive research, the exact mechanism that instigated the massive carbon release during the PETM remains unresolved, although the findings of recent studies have indicated a temporal correlation between magmatism in the North Atlantic Large Igneous Province (NAIP) and the PETM. This evidence suggests that volcanic activity in NAIP was likely to have been the trigger of the climatic perturbation. While this hypothesis adds to our insights into the triggering mechanisms of PETM event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xact cause-and-eff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volcanic activity and climate fluctuations during this transition period remains incomplete.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to fully establishing this relationship is the difficulty of accurately tracing volcanic activity in the sedimentary record during this period, due to the complex nature of volcanic products and their subsequent alteration over millions of years and the problem of identifying and distinguishing between different volcanic events. **[Conclusions and Prospects]** Recently, mercury (Hg) concentrations and their isotopic compositions in sediments have emerged as promising tools for tracing volcanic activity throughout geological history. However,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focus on the Hg record of the PETM was largely limited to near-shore areas proximal to the NAIP eruption sites. Few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Hg concentrations in sediments from open-ocean regions located at a considerable distance from the eruption centers, leaving a significant gap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broader extent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NAIP. The spatial limitations of this study restricted our ability to fully assess the global impact of volcanic emissions on the Earth's climate and ecosystems during the PETM. This paper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research on the use of mercury deposition as a tracer of ancient volcanic activity during the PETM. It identifies existing research limitations and suggests key direc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It also reviews the possi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olcanic activity of the NAIP and the climatic events of the PETM, emphasizing the need for furthe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o resolve outstanding issues and refin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is critical period in the Earth's history.

Key words: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North Atlantic Large Igneous Province; mercury concentrations and isotopes; ocean deoxygenation